代表作品1：兴隆巷事件 重庆地下党经历血与火的洗礼

本报记者 牛瑞祥 黄琪奥

　　核心提示

　　1928年3月至10月，在短短8个月的时间里，刚刚成立的中共巴县县委的领导机关三次遭到以刘湘为首的军阀政权的严重破坏，数十名党团干部先后被逮捕、杀害，是中共重庆地方党史上的悲壮一页。

　　3月9日，正在重庆城区兴隆巷8号举行的中共巴县县委成立大会被警察包围，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傅烈、省委组织局主任兼巴县县委代理书记周贡植等不幸被捕后慷慨就义。建立仅一月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正欲成立的巴县县委被破坏，史称“兴隆巷事件”。

　　兴隆巷事件后，中共四川省委任命喻克由为县委书记，重组巴县县委。3月28日，喻克由回家探亲时被捕，刚建立不到半个月的中共巴县县委又遭到破坏。

　　不久，中共四川省委再次建立巴县县委。当年10月1日，由于叛徒出卖，敌人在重庆城区大搜捕，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张秀熟、巴县县委书记王松樵、团县委书记池望秋等数十名党团干部先后被捕，中共巴县县委第三次遭到破坏。

但是，刚毅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敌人的白色恐怖所吓倒，他们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中。其间，党在重庆地区的地下组织又多次遭破坏，到1935年春夏，几乎被破坏殆尽。直到1936年6月漆鲁鱼等人成立重庆救国会，又为重庆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奠定了基础。

　　“打倒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1928年4月3日，朝天门沙嘴刑场，9名青年高呼口号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

　　当时的报纸这样报道了这一事件：“行刑号声一响，凄恻声中，首点其所谓中央共党特派员贺泽（即傅烈）者上。贺年廿余，身体甚伟壮，发长寸许。头圆而大，面作微哂状……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

“这9人是当时中共在四川和重庆的领导成员，包括省委书记傅烈、省委组织局主任兼巴县县委代理书记周贡植等，他们都因为兴隆巷事件而殉难。”7月13日，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科员黎余对记者说。

巡警“收捐” 意外引发灾难

　　7月的重庆，骄阳似火。

　　尽管不是休息日，但解放碑商圈依然人流如织，协信星光时代广场前不时有外地游客匆匆而过。记者在查询对比了民国时期的重庆地图，又咨询渝中区文管所工作人员后确认，如今这座大型商场的位置大致就是以前的兴隆巷，重庆党史上著名的兴隆巷事件便发生于此。

　　时光回到1928年3月9日，中共巴县县委成立大会准备在兴隆巷8号的灰色小楼里举行。

　　下午2点，前来主持会议的傅烈刚走进房内，喝了口水，正准备说话，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有人在外面大声地喊道：“收捐！收捐！”屋里的人相互看了看，都没有出声。

　　原来，当天三个巡警上门来收“公巡捐”，在楼下没见到人，便上楼来催缴钱款。当他们看到一屋子的年轻人围坐在桌边时，便以为是在聚众赌博，马上堵住门口大喊：“抓赌！”并吹口笛呼唤其他警察前来。

　　就在屋内一片混乱时，傅烈从凳子上站起来，示意大家冷静，并开始与警察理论。但当其中一名警察从屋内搜出一个袋子时，傅烈、周贡植等人的脸色都为之一变……

“警察搜出的文件就是党组织的名册、文件及传单。这个意外事件的发生，让中共四川省委和正欲举行成立大会的巴县县委遭到严重破坏。”黎余说。

傅烈入川 重建地下党组织

　　事实上，兴隆巷事件发生时，距中共四川省委成立也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1927年，震惊中外的“三三一惨案”发生后，中共在四川的领导机关——中共重庆地委遭到破坏，领导人杨闇公、冉钧等不幸殉难，幸存的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也大量转移，中共组织在重庆地区遭到严重破坏。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当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指派骨干成员到四川重建组织。不久，受党中央派遣的傅烈、周贡植等，联络动员了一批散落在武汉、宜昌一带的川籍共产党员返回四川，重建党组织。

　　在傅烈、周贡植等人的努力下，重庆的革命工作慢慢复苏。1928年2月10日，傅烈等人在周贡植家召开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在这场为期6天的会议上，除了宣告中共四川省委成立外，大会还根据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着重讨论了由傅烈起草的《四川省暴动行动大纲》，研究和讨论了全省利用春荒举行暴动等问题。周贡植也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省委组织局主任。

　　经过紧张的筹备，傅烈在3月初以“渝一组织”的名义发出通知：“经省委决定：组织县委，并指定你为县委XXX（职务），定于3月9日在话语楼8号（即兴隆巷8号）开成立大会，希按时出席。”

但谁也没想到，成立大会还没正式开始，兴隆巷事件就给中共在四川和重庆的地下党组织带来几乎毁灭性的打击。

宁死不屈 9名烈士英勇就义

　　“长官，我说过多少次了，我叫贺泽，是名广东的商人，并不是你们要找的傅烈。”1928年3月10日，重庆卫戍司令部内，得知抓到中共“大鱼”，时任重庆警备司令王陵基亲自审讯傅烈，而伤痕累累的傅烈却一直用粤语坚持着这样的说辞。

　　“在被捕之后，傅烈在狱中坚贞不屈，受尽了敌人的酷刑。”黎余介绍，敌人先用煤油灌进傅烈嘴里，再用铁丝穿着两个大姆指把他吊起来打，姆指关节折断了，又上夹板继续吊打。尽管数次被敌人折磨得昏死过去，但傅烈仍咬紧牙关。当敌人逼问他口供时，傅烈斩钉截铁地说：“砍断我的头颅，也休想从我身上得到你们需要的片言只字！”

　　在狱中，傅烈依然惦记着党和同志，曾两次通过探监的地下党员送信给组织，告知需要转移的材料存放的地点，以及对重建党组织的建议。同时，他还写了两封家信。在给父亲的信中，他写道：“我这次牺牲并不出于意外，父亲不必过于悲伤，我自问没有什么对不起家庭的地方……若干年后，你一定理解（我）的。”而另一封给妻子陈才用的信中，他说：“你是知道我怎样死的和为什么而死的！你要为我报仇，要继承我的遗志，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

　　兴隆巷事件的发生，直接导致傅烈、周贡植等9名烈士英勇就义。

而对于重庆的地下党组织来说，磨难这时候才刚刚开始，在随后的数年时间里，地下党组织又多次遭到敌人破坏，到1935年时，重庆的地下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但革命的火种在巴渝大地从未熄灭，1936年6月漆鲁鱼等人成立重庆救国会，又为重庆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奠定了基础。

代表作品2：没留下姓名但留下了信仰

红军司务长血染綦江茅坝坪

本报首席记者 李珩 实习生 李行芩

　　核心提示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开始长征。

　　在这场行程约二万五千里的行军作战中，红军转战14个省，冲破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经受了艰难险阻的考验，终于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

　　1935年1月15日，红一军团派红二团进驻綦江县羊角场；1月21日，红一军团8000多人从贵州松坎出发，经贵州桐梓县尧龙山镇箭头垭，宿营石壕镇。綦江，也是中央红军长征在重庆唯一路过的地方。

就在这短短的一段征途中，红一军团的一位司务长被贵州盐防军抓获。敌人对司务长百般折磨，用尽酷刑，但司务长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被残忍杀害。其对革命的坚定信仰让百姓泪目，红军精神也在百姓心中扎了根，为綦江人民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

　　被敌人吊在树上的他几乎失去了意识。

　　这时，一碗冒着热气的米饭放在他面前，是好心的农民老乡偷偷给他送饭来了。

　　“这名老乡会不会被我连累？”这是他的第一反应。

　　“老乡，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是专门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我已经不行了，你赶快把饭端回去吧，不然会连累你的。”他拒绝了老乡的好意。

　　这天夜里，大雪纷飞，温度低得可怕。

“他就是当时红一军团的一位司务长，虽然我们多方考证，却无从知道他的姓名。”近日，指着高耸的红军纪念碑，綦江博物馆馆长周铃有些遗憾地说，这位司务长的具体年龄、籍贯也不祥。

　　为归还百姓物品

司务长被敌人抓获

　　红军纪念碑位于綦江区石壕镇长征村茅坝坪，当车子在山路上行驶一个多小时后，记者来到纪念碑前。在苍翠青柏的掩映下，纪念碑显得庄严而肃穆。

　　顺着纪念碑一旁蜿蜒的台阶再向下走100多米，周铃指着一处杂草覆盖的角落说：“这里就是司务长牺牲的地方。”

　　时间回溯到1935年1月21日中午，红一军团的一部分红军战士在贵州省桐梓县尧龙山镇的箭头垭（渝黔边境交界处的小街道）休整完毕后，准备向石壕镇行进。

　　“报告首长！在箭头垭还有苏区纸币，老百姓的物品也没归还！”一名红军战士向红军首长反映道。

　　“那可不行，快用银元把纸币换回来。”在首长的命令下，司务长和两名红军战士留了下来，负责清点归还借用老百姓的物品，并用银元换回苏区纸币。

　　当他们一路来到箭头垭街上的赵家，准备归还筲箕时，突然，20多人冲出来将他们团团围住，对准他们的是黑洞洞的枪口。

　　原来他们三人早就被盐防军的姜金全等人盯上了。

　　敌众我寡！一番搏斗下，一名战士当场牺牲，另一名战士也负了伤。为掩护这名受伤的战士突围，司务长落入了盐防军之手。

“其实，司务长是有机会逃脱的，但为救负伤的战友，他又折了回去。”周铃说。

　　酷刑逼供

司务长没透露半点信息

　　“司务长可能想到了被敌人抓住的后果，但敌人却远比想象中凶残。”65岁的王文芬是土生土长的綦江人，从父辈起就住在长征村，从小她就听父亲说起过红军司务长的故事，“那些酷刑是常人难以承受的呀！”

　　在王文芬的叙述中，记者仿佛看到了那些惨烈的画面。

　　“说吧，红军往哪走了？你们的路线是什么？你叫什么？什么职务？”面对姜金全的威逼利诱，司务长一个字都没有吐露。

　　“看你说不说，给我‘搬地均’，醒他的酒！”姜金全怒了，大声咆哮道。

　　几个人把司务长推倒在宰杀猪牛的条石上，条石两端各有酒杯大小的孔。他们将司务长双臂绑紧朝下，腹部朝上，一端用绳子套紧他的头发，另一端则套紧他的双脚。如此一来，司务长的嘴只能张着，却发不出声音，加之双臂压在下面，痛苦不堪。这就是“搬地均”刑罚，也叫“醒酒杯”。他们把司务长绑在条石上后就扬长而去。

　　酒足饭饱后，姜金全又回来，把套司务长头发的绳子松开，使他的嘴可以闭上，也能发出声音。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姜金全叫嚣道，换来的却是司务长的怒视。

　　姜金全又多次往司务长嘴里灌石灰水，却还是没从司务长口里得到一点消息。

“不说就给老子‘踩杠子’！”大怒之下，敌人把扁担从司务长捆绑着的两条小腿中间插进去，用一条小腿作支点，踩住扁担的一端，去撬另一条小腿。铺天盖地的疼痛让司务长晕了过去。

　　怕连累老乡

坚持不吃老乡送的饭菜

　　当晚，敌人将遍体鳞伤的司务长拖到了牛角尖，把他吊在农民赵兴伍家坝子边的一棵桑树上，脚尖触地，吊了整整一夜。

　　夜里，正值山里最冷的时候，大雪纷飞，寒风凛冽。

　　赵兴伍知道敌人的脾性，也不敢多问，眼见司务长全身伤痕累累，于心不忍的他趁敌人在屋内围着火炉喝酒吃肉时，偷偷地端了碗饭来到树下。

　　“你快吃点吧，不然你会熬不下去的。”

　　“老乡，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是专门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我已经不行了，你赶快把饭端回去吧，不然会连累你的。”司务长的声音很微弱，却很坚定地摇了摇头。

　　赵兴伍放心不下司务长，迟迟不肯离去。可无论他如何劝说，司务长仍然坚持不肯吃饭。

　　“快走吧，快走吧，老乡……”此时，司务长已经奄奄一息，连说话的力气都快没有了。

　　赵兴伍害怕被屋里的敌人发现，只好叹了叹气，眼含热泪地把饭端了回去。

　　第二天，敌人用“穿心杠子”把红军司务长抬到茅坝坪。所谓“穿心杠子”，就是用绳子把他的手和脚捆在腹前，再用一条长的杠子从手脚中间的空隙穿过去抬着走。

　　来到茅坝坪，敌人继续对司务长使用酷刑。他们把司务长的双手合抱在一根木桩上捆紧，将一根一端开口的木条在他的两个拇指中间绑紧，然后用一个木削子往木条开口处敲打，每敲一下，两个拇指就被绳子勒得更紧。司务长疼得脸都白了，依然钢牙紧闭。

　　“不说，给老子烙！”敌人无计可施，叫人拿来烧红的烙铁，滚烫的烙铁一下下落在司务长身上，司务长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却丝毫不肯屈服。

　　气急败坏的姜金全再也没有耐心了，决定杀死司务长。

　　“中国工农红军万岁！打倒军阀！”司务长在生命最后一刻高呼道，气得敌人割掉了他的舌头，又向其开枪射击……司务长倒在了血泊中，枪声久久回荡在山谷中。

　　等敌人离开后，当地百姓杨贵华、杨献州、张海、杨子州等含着热泪将司务长的遗体就地掩埋。

　　“从司务长身上，我看到了坚定的信仰，正因为这份信仰，支撑着他对革命的忠诚。”周铃说，他是众多红军战士的缩影，他将信仰的火种播撒在重庆这片土地上，让红军精神牢牢扎根于百姓心中，极大地鼓舞了重庆人民革命的信心。

　　20世纪60年代，原綦江县石壕区羊叉乡政府在司务长牺牲地修建了红军烈士墓。1981年，其遗骸被迁葬于石壕红军烈士墓。2010年11月，红军纪念碑在茅坝坪被修建起来，以供后人瞻仰。为弘扬司务长坚定的革命精神，原綦江县文管所专家走访多位老人，还原了司务长牺牲的过程。

代表作品3：为什么战旗美如画

——酉阳南腰界游击队员符治义守护红旗的故事

本报记者 吴国红 李星婷

　　核心提示

　　1934年，由于国民党重兵围剿，红军第三军损失惨重。6月4日，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三军来到湘鄂川黔四省交界的酉阳南腰界。

　　在这里的4个多月里，红三军建立了以酉阳南腰界为中心的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包括1个特区、17个区苏维埃政权、10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同年10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与红三军会师于此。

南腰界游击大队（当时4支游击大队之一）队员符治义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优秀游击队员的经历，正是红军将革命火种播撒在这块红色土地上的见证。

　　1975年初秋的一个早晨，天刚蒙蒙亮，从酉阳南腰界到贵州木黄的山头间，一个身影正朝木黄蚂蟥山行走。

　　这个身影是家住南腰界镇红岩村的符治义。

　　符治义曾是南腰界游击大队队员，右腿在战斗中受过伤的他，一瘸一拐地来到蚂蟥山的一个山洞前。

　　看到当年自己用石头在洞口刻下的标记还在，抑制住内心的激动，符治义小心翼翼地扒开草丛——一支长约1米多的旗杆、一柄旗刀（因红旗旗杆顶部形似小刀而得名），以及一个锈迹斑斑的旗笼（装红旗的铁笼），赫然出现。

　　刹那间，符治义的眼前浮现出41年前，贺龙带领他们宣誓加入红军游击队时的情形。

“这是贺将军交给游击队的战旗，今天我把它找回来，交还给政府。”那天，直到天黑，符治义才回到家，面对围观的乡亲们，他这样说。

　　革命

“我们红军只打土豪恶霸，保护受苦老百姓！”

　　7月26日一大早，我们从酉阳县城出发，往西南方向，沿凤凰山盘旋而上。车行半山腰时，公路边出现一块红色旗帜模样的石碑，上面刻着醒目的几个字——红色南腰界。

　　“贺龙是1934年6月4日从贵州晓景来到南腰界的。”南腰界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黄孝忠介绍。在他的引导下，我们走进位于南腰界正街东头一个四五百平方米的大院。

　　这里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这院子原本是清末秀才余兰城的住宅，叫余家桶子。”黄孝忠说，贺龙在南腰界时，司令部就驻扎在余家桶子，部队分散住在方圆几里的村寨。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之所以选择以南腰界为中心建革命根据地，原因之一是这里地处湘鄂川黔四省边区结合地带，人口多、兵员广，有利于队伍的壮大。”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红色景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白明跃说，但红军刚来南腰界时，不明实情的老百姓受国民党谣言的蛊惑，纷纷躲了起来。

　　于是，红军便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符治义就是在这个时候参加游击队的。

　　住在南腰界红岩村的符宁江是符治义的儿子。他告诉我们，父亲以前给一冉姓地主家放牛。有一天，17岁的符治义正在余家桶子附近的山坡上放牛，一位身穿军装的干部走上前来，请他进院子喝水、歇脚。

　　符宁江打小就常听父亲回忆当时的情景——

　　院子里，有几个战士正在劈柴。其中一个蓄着浓密一字胡的魁伟大汉走过来，握住他的手说：“老乡啊，让你们受惊了！快拿板凳来坐。”

这个人便是贺龙。贺龙跟符治义拉起家常，还挽留他一起吃饭。“你们把躲出去的群众都喊回来，生产的照样生产，教书的照样教书，做生意的照常做生意。”临走时，贺龙指着院子上方飘扬的红旗对符治义等人说，“你们看，那上面的镰刀代表农民，斧头代表要砸出一个新世界。我们红军只打土豪恶霸，专门保护受苦老百姓！”

　　誓言

“打铁不怕火烫脚，革命不怕砍脑壳！”

　　从余家桶子出来，向右拐，便是红军街。这条不足一公里长的街道上，密布着当年的红军医院、红军大学等十余处文物景点。

　　经过忠烈祠时，符宁江告诉我们：“父亲在给地主放牛时没少挨打，经常不给饭吃。看到这支部队是为受苦老百姓闹革命，就下定决心跟着干。”

　　正是在忠烈祠，符治义、冉隆昌、陈显朝、池宽成等30多人，参加了贺龙主持召开的群众积极分子会议。会后，大家分别到自己住的村子去发动群众。

　　“我们是工农红军，打倒土豪，穷人要翻身……”这首歌是驻南腰界的红军教符治义唱的。后来，符治义在发动群众闹革命的过程中，又教给老百姓唱。“我从小就常听父亲唱这首歌。”至今已62岁的符宁江仍能很熟练地哼唱此曲。

　　经过一个多月的宣传工作，南腰界周围各地的游击队陆续建立起来，队员总共有八九百人。

　　继续沿红军街的青石板路前行，我们来到位于红军街东轩门的土地庙。

　　“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家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在土地庙的墙上，留有当年红三军宣传队长樊哲祥用毛笔书写的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落款是“红三军宣”。至今字迹依然清晰完整，十分醒目。

　　当年，符治义就是在这里宣誓正式加入南腰界游击大队的。几十个游击队员成两列横队，站立在南腰界街口的土地庙前。符治义笔直地站在中间，面对土地庙墙上写着的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举起右手，庄严宣誓。

　　宣誓后，贺龙给游击大队队长授了红旗和枪支。“红旗是革命的象征，枪支是革命的武器，我们要用枪支和生命保护红旗，将革命进行到底！大家有信心吗？”

“打铁不怕火烫脚，革命不怕砍脑壳！”符治义和大家一起响亮地回应着贺龙。

　　护旗

“战士可以倒下，但红旗不能倒地！”

　　1934年10月27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两支队伍在南腰界举行了会师大会，符治义骄傲地站在队伍中。

　　从余家桶子下行几百米，我们来到当年会师大会的会场——猫洞大田。昔日这里是一片金黄的稻田，如今屹立于此的会师纪念碑，似乎仍在默默地诉说那一段辉煌的往事。

　　在几块简易的木板搭成的主席台上，贺龙、任弼时、萧克等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台下，红旗飘扬，歌声震天；田野里、山岗上，到处是欢呼雀跃的红军……这是符治义常常给符宁江兄弟俩描述的情形。

　　然而，当时的形势不容乐观。“六军团的同志来到这里，按理是该休息的。但蒋介石不让我们休息。黔东根据地是新近开辟的，还不很巩固、可靠。”贺龙在会师大会上如是说。于是，会师大会翌日，贺龙便挥师挺进湘西。

　　为了掩护大部队，符治义所在的南腰界游击大队在木黄蚂蟥山一带，与围追堵截的还乡团激战了一天一夜。

　　战斗激烈程度如何？符宁江不知道。但父亲誓死护旗的情景，他在听了父亲无数次的讲述之后，仿佛亲眼所见。

　　蚂蟥山一战，殊死搏杀。枪林弹雨中，扛着战旗的游击队员不幸中弹倒下，另一名游击队员立即冲上去，继续扛起战旗。但，凶狠的敌人瞄准旗手进行射击，4名游击队员因为护旗先后倒下。

　　“战士可以倒下，但红旗不能倒地！”符治义一边喊着，一边纵身一跳，伸手接过旗帜。也就在这一当口，敌人的一排子弹扫过来，打中符治义的右小腿，战旗也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

　　符治义腿一软，跪倒在地。但尽管如此，战旗不能倒！他把牙一咬，用劲全身力气，将旗杆深深地插在阵地上。

　　这一仗，打得昏天黑地。天黑时，双方均伤亡惨重。由于符治义腿部受伤，受命不再随部队前行。

　　考虑到红军走后，还乡团会在各地疯狂报复杀戮，符治义便就近寻了个山洞，将被子弹打得只剩旗杆与旗刀的战旗以及旗笼藏进去，并作好标记。

　　回村后，符治义以打铁为生，一直没离开过南腰界。直到1975年，得知县文物办到南腰界收集红色文物，他走了一天，在蚂蟥山找到当年藏好的旗杆、旗刀和旗笼，便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如今，它们都保存在四川省历史博物馆。

　　符宁江说，父亲一直都记得，贺龙对他说的革命的意义。他后来也常给来看望他的老师和学生们，讲关于这面战旗的故事。

　　1981年，符治义当上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政协委员。1983年，66岁的符治义去世。